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周 兴 赵 洁

提 要：家庭金融脆弱性反映了家庭在面对外部经济波动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本文将家庭金融脆弱性纳入生育意愿的研究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为分析家庭生育意愿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越高，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越少。细分样本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和有男孩家庭的生育意愿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家庭金融脆弱性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家庭收入

一、引 言

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和老龄化加剧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育率逐渐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新出生人口数量仅为1200万人。为应对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逐步从紧缩型调整至适度宽松型，“十二五”初期取消生育间隔，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放开将会放松生育约束，但政策实施效果也取决于微观家庭基于生育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生育决策。研究表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在短期可以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石智雷、杨云彦，2014；杨菊华，2015），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

无法有效地提升居民生育意愿，那么生育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作用将十分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下降（王金营、戈艳霞，2016；陈卫、段媛媛，2019）。因此，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对我国居民家庭生育意愿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近年来外部经济波动的加剧对许多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家庭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取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不同家庭之间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存在差异，在应对外部冲击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在外部经济波动加剧的当下，家庭金融脆弱性在家庭应对经济风险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影响家庭诸多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张冀等人（2020）认为家庭金融脆弱性在本质上是风险，但需要明白风险客观存在且无法人为消除，因此应关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本文借鉴张冀等人（2020）将家庭金融脆弱性定义为紧急情况下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遭遇风险时，难以弥补资金缺口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家庭金融脆弱性较强。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和生育文化中，婚姻和生育一般需要稳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面临风险冲击的家庭可能会因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而调整生育意愿。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较强的家庭，突发事件对家庭资源造成的挤压更大，进而可能对其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相比于收入、家庭资产等指标，将家庭金融脆弱性和生育意愿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不局限于家庭经济状况，而是从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究微观家庭生育行为的决策机制，为分析家庭生育意愿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实证研究，分析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本研究有助于认识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现状，加深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理论认识。此外，在当前经济波动加剧的现实下，关注和研究家庭金融脆弱性，不仅有利于提高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有益于优化相关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对于缓解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概述本文

的研究内容及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评述，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总结研究现状和有待改进之处，明确本文的努力方向和创新点；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介绍本文所用的数据及变量处理；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基本回归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通过更换模型和限定样本范围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六部分为结论及讨论，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尝试提出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关于生育意愿的内涵，目前国内学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姚从容等（2010）提出了生育意愿的四维内涵，即生育意愿包括数量（意愿生育子女数）、性别（意愿生育性别）、时间（生育间隔）和动机（生育目的）四个方面。在生育意愿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文献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研究框架。在经济学方面，除贝克尔（Becker, 1960）的新家庭经济理论外，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5）认为生育意愿取决于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而卡德维尔（Caldwell, 1976）从代际间财富流向的视角，认为工业化之后家庭内部财富从父母流向子女，孩子的养育成本升高且预期收益下降，从而生育意愿普遍降低。李建民（1994）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可归结为效用最大化、成本—收益比较、质量—数量替代和竞争约束四种机制。在社会学方面，爱染与克洛巴斯（Aizen & Klobas, 2014）提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这三个因素。而罗西耶与贝尔纳迪（Rossier & Bernardi, 2009）则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会通过社会学习、社会影响和社会支持这三个机制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科尔和瓦特金斯（Coale & Watkins, 2017）提出了社会互动的概念，认为社会互动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文化扩散理论在社会网络和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延伸而出，勒斯特海与苏尔金（Lesthaeghe & Surkyn, 1988）认为生育意愿和水平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观念会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传播。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占多数。生育意愿不仅是个人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氛围，其影响因素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个方面。尹豪和徐剑（2008）认为经济性因素主要体现为对生育孩子所需

成本和效用的预估，高昂的生育和养育成本是许多家庭考虑生育的重要因素；张霞和夏巧娟（2018）指出从家庭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孩子是一种“家庭耐用消费品”，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也会提高。尽管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生育孩子的经济压力，但同时会增加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上升会降低生育水平。家庭杠杆率的上升也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和生育等经济行为，柳清瑞和刘淑娜（2020）发现家庭杠杆率的提高推迟了我国城乡妇女初育年龄，导致城乡家庭生育孩子数量进一步减少，陈卫民和李晓晴（2021）提出生育意愿低不在于养不起孩子，而是在通过消费维护和提升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生育意愿受到了挤压。周晓蒙（2018）则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了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地位、女性职业劳动收入占比）和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家庭经济地位提高对于生育意愿产生了正向的作用，而教育水平和女性职业劳动收入占比对生育意愿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社会文化及公共政策等社会性因素对于生育意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勒斯特海（Lesthaeghe, 2010）研究发现，在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出现、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戈尔茨坦等人（Goldstein et al., 2003）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环境会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使得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谢永飞和刘衍军（2007）认为我国“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观念仍然是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政策因素的引导也会促进生育意愿的变化。罗尼（Lonnie, 2005）的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低生育意愿与其公共福利政策、社会化的健康照顾、女性普遍教育计划相关。在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孟轲（2008）研究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邓昌荣（2007）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的兄弟姐妹数量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在我国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学者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角度，就政策对符合条件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张晓青等（2016）以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家庭为研究对象，发现两类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但在生育动机上存在差异。

有关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为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明斯基（Minsky, 1982）使用脆弱性描述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和冲击会影响市场价格和资金流量，高负债的行业特点导致金融业更容易失败。由于宏观金融脆弱性会影响家庭福利和消费，脆弱性被引入微观家庭的相关研

究中。早期关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重点是贫困，主要从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的角度与贫困线进行比较，库卡（Kochar，1995）指出若低于贫困线或未来有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家庭经济是脆弱的。利贡与谢克特（Ligon & Schechter，2003），克拉森与卫贝尔（Klasen & Waibel，2015），德肯与克里希南（Dercon & Krishnan，2010）分别用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期望贫困的脆弱性和风险暴露的脆弱性来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由于仅研究贫困家庭不够全面，且贫困线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后续研究将脆弱性研究扩展至普通家庭。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如卢萨尔迪尔等人（Lusardi et al.，2011）用30天内拿出2000美元的能力来衡量美国家庭经济的脆弱程度。国内文献对家庭脆弱性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关注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张冀等人（2016，2020）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后经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普遍存在由死亡风险导致的金融脆弱性，并进一步使用CFPS数据中筹集2万元款项的难度来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发现我国家庭具有金融脆弱性普遍存在且脆弱性程度较高的特点。

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相关研究仍有待完善。首先，当前国内文献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注程度不够高，相关研究较少，而家庭金融脆弱性作为社会整体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次，在目前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中，虽已有部分文献从家庭经济状况如收入、负债等角度分析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十分匮乏。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差异表现为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不同，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家庭会由于未来不确定性增大而改变家庭资源配置，进而会对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充实了国内相关研究。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来自2018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CFPS使用内隐分层、多

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收集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层次的数据，基线样本覆盖 25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代表中国 95% 的人口，具有较好的可信度与代表性。

（二）变量描述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分析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探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是常用的考量家庭生育意愿的指标之一，为此我们设定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期望生育子女数，从数量维度衡量居民家庭的生育意愿。具体参考 2018 年问卷中“您认为生育几个孩子比较理想”的相关数据，为计数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脆弱性，借鉴张冀等人（2020）的处理办法，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问卷中的问题构建衡量指标。问卷中原始问题为“紧急情况下，需要尽快筹集一笔 2 万元的资金，您认为筹钱的困难程度如何”（筹集资金指借款，不包括使用 2 万元的自有资金），选项分别为“很困难”“比较困难”“一般”“比较容易”“很容易”。将家庭金融脆弱性赋值 1—5，分别与筹款难度相对应。突发状况下筹集资金难度越大，则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越高。解释变量使用 2014 年的数据一方面是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反映出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具有长期特征；另一方面使用滞后期的解释变量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反向因果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适当选取。生育决策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且已婚家庭的生育意愿更为贴近真实的生育行为，因此本文选取已婚样本作为考察对象，从个体和配偶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第一，个体社会及经济特征，包括：年龄，指 2018 年调查时的年龄；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赋值为 1，农业户口赋值为 0；教育程度，使用受教育年限衡量；是否有养老保险，参加养老保险赋值为 1，未参加则赋值为 0；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储蓄，对原始数据取对数；现有子女数量，通过问卷中问题生成；是否在家居住，在家住赋值为 1，不在家住赋值为 0。除以上客观变量外，还选取主观变量，对以往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具体包括：自评健康程度，数值从 1 到 5 依次表示“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男孩偏好，通过对“期望生育男孩的数量”进行衡量，数值越大表示男孩偏好程度越强。传统观念，通过对“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进行衡

量, 数值 1 表示“不重要”, 数值 5 表示“非常重要”, 数值越大表示对传统观念认同越强。第二, 配偶社会及经济特征, 包括: 配偶年龄, 即 2018 年调查时的配偶年龄; 配偶教育程度, 同样使用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 配偶是否在家住, 配偶在家住赋值为 1, 配偶不在家住赋值为 0。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结合数据可得性处理原始数据。从原始数据来看, 已有孩子数量中五孩以上的占比不到 2%, 为保留更多样本同时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将现有子女数量超过 5 个的赋值为 5; 将选择“无法判断”“不知道”“不适用”“拒绝回答”的数据替换为缺失值; 经以上处理并删去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 得到 2984 个观测值。所有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个	1.86	.74	0	10
家庭金融脆弱性	数值越大脆弱性越高	3.03	1.19	1	5
年龄	岁	44.80	10.86	21	86
配偶年龄	岁	40.82	10.93	16	83
现有子女数量	个	1.43	0.78	0	5
家庭人均收入	取对数	10.18	.95	6.80	11.95
家庭人均储蓄	加 1 后取对数	7.53	3.91	.00	14.04
教育	受教育年限	10.72	4.19	0	19
配偶教育	受教育年限	10.16	4.39	0	22
自评健康	数值越大越不健康	2.97	1.07	1	5
男孩偏好	数值越大偏好越强	.85	.67	1	10
传统观念	数值越大观念越强	3.93	1.13	1	5
变量名	含义	变量 = 1 (百分比)		变量 = 0 (百分比)	
户口类型	1—非农 0—农业	69%		31%	
党员	1—党员 0—非党员	12%		88%	
是否有养老保险	1—是 0—否	72%		28%	
是否在家居住	1—是 0—否	98%		2%	
配偶是否在家住	1—是 0—否	96%		4%	
观测值		2984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 样本中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均值为 1.86, 低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 1.96。家庭金融脆弱性均值为

3.03，表明样本中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较高。受访者平均有 1.43 个孩子，非农户口占比 69%，参加养老保险的达到总样本的 72%，自评健康状态良好，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72 年，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16 年，受教育程度差异不大。受访者及配偶绝大多数都在家居住。在生育观念上，家庭平均意愿生育男孩数量为 0.85 个，显示出大多数家庭具有较明显的男孩偏好，认同“传宗接代重要性”的均值高达 3.93，表明样本群体的整体观念较为传统。

四、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重点在于检验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_{ij} = \alpha + \beta X_{ij} + \gamma Z_{ij} + \varepsilon_i + \mu_{ij}$$

Y_{ij} 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代表省份 i 中个体 j 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X_{ij}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省份 i 中个体 j 所在的家庭金融脆弱性。 Z_{ij} 为上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个体及配偶的相关信息。 ε_i 为省份固定效应，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生育文化等影响生育意愿的不可观察特征，我们通过固定效应控制不同省份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 μ_{ij} 为随机扰动项， β 和 γ 是对应变量的系数， i 代表省份， j 代表个体。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使用 OLS 方法，为增强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控制省份固定效应。考虑不同个体可能会受到共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度。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家庭金融脆弱性	-.0027 (.0064)	-.0236 *** (.0077)	-.0248 *** (.0076)	-.0280 *** (.0086)

续表

变量	(1)	(2)	(3)	(4)
年龄		-.0009 (.0010)	-.0014 (.0010)	-.0001 (.0025)
教育		.0043 (.0026)	.0072 ** (.0026)	.0071 * (.0031)
户口类型		-.0661 ** (.0209)	-.0579 ** (.0209)	-.0466 * (.0244)
党员		.0766 ** (.0244)	.0681 ** (.0241)	.0656 ** (.0255)
现有子女数量		.1950 *** (.0156)	.1850 *** (.0157)	.2070 *** (.0198)
家庭人均收入		.0121 (.0103)	.0126 (.0103)	.0123 (.0116)
是否在家居住		-.0297 (.0465)	-.0322 (.0463)	-.0572 (.0964)
是否有养老保险		-.0229 (.0174)	-.0219 (.0173)	.0179 (.0197)
家庭人均储蓄		-.0025 (.0017)	-.0023 (.0017)	-.0030 (.0019)
自评健康			-.0050 (.0087)	.0055 (.0094)
男孩偏好			.0347 *** (.0060)	.0343 *** (.0068)
传统观念			.0291 *** (.0070)	.0241 ** (.0082)
配偶年龄				.0002 (.0025)
配偶教育				-.0002 (.0023)
配偶是否在家住				.0308 (.040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7720 *** (.0505)	1.5590 *** (.1350)	1.3580 *** (.1400)	1.2900 *** (.1840)
观测值	2984	2984	2984	2984
调整后拟合优度	.0700	.1550	.1650	.1820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2中第一至四列是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即家庭金融脆弱性、个体相关的客观变量、个体相关的主观变量和配偶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个体、配偶等变量,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紧急情况下筹集资金难度越大,则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越大,意愿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1个单位,会引起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降约0.03个,且该结果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此结果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结婚和生育需要家庭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家庭一般会在累积相应经济资源后选择婚姻和生育。在面临风险冲击的情况下,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意味着家庭抵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家庭会基于风险冲击和现实情况进行考量,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家庭经济资源相对紧缺,在生育面临较强经济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将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孩子,降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

在控制变量中,现有子女数量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户口群体的生育意愿更低,与已有研究的发现较为一致。在生育观念上,个体对于男孩偏好和传统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则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越多。

(三)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和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居民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接下来我们尝试探究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不同群体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影响的异质性,主要从家庭收入、有无男孩等角度进行考察。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对处于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而言,在做出关于生育的决策时,考虑家庭金融状况的权重存在差异,那么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可能会在不同的收入分位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样本分布,以收入的25%、50%、75%为界,将收入从小到大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并对四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根据回归结果,根据收入细分样本,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的群体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会由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而降低,而对低收入和高收入的群体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论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首先对于高收入家庭,往往会有更多收入渠道、投资渠道,在面临经济风险时,家庭金融脆弱性对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

响较小。而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父母对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往往会有较高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家庭经济风险意识也通常较低。因此低收入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敏感度较低，在面临经济风险时，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表 3 异质性分析—收入差异

变量	低收入	中等收入	较高收入	高收入
家庭金融脆弱性	-.022 (.017)	-.035 ** (.016)	-.041 ** (.021)	-.002 (.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34 *** (.355)	1.571 ** (.614)	2.620 *** (.922)	.812 (.536)
观测值	710	726	824	724
调整后拟合优度	.284	.194	.197	.186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中国传统的观念有较强的男孩偏好，如果家庭中已经生育的孩子中有男孩，往往被认为是“后继有人”，因此无男孩的家庭会倾向再生育，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较高。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可能会由于家庭是否已有男孩而存在异质性。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在已有男孩的家庭中，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会显著降低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已有男孩的家庭中，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相对较少，在面临经济风险时，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更容易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相反由于男孩偏好的存在，无男孩家庭为追求生育男孩，往往会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因此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对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敏感度较低，即使在面临较高的金融脆弱性时仍会为了追求生育男孩而继续生育。

表 4 异质性分析—男孩差异

变量	有男孩	无男孩
家庭金融脆弱性	-.041 *** (.012)	-.021 (.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续表

变量	有男孩	无男孩
常数项	1.207 *** (.226)	1.038 *** (.221)
观测值	1183	1698
调整后拟合优度	.142	.221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稳健性检验

(一) 更换估计模型

本文中解释变量为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是取非负整数的计数变量，可能由于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假设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本文改变模型的估计方法，使用负二项模型进行估计，可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5。需要注意，使用负二项模型直接得到的回归结果中，系数不是边际效应。最后一列计算了控制所有变量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边际影响。表5最后一列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后，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1个单位，会导致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减少约0.03个，且该结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更换计量模型后，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同样证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更换模型

变量	(1)	(2)	(3)	(4)	边际效应
家庭金融脆弱性	.0009 (.0036)	-.0158 *** (.0044)	-.0166 *** (.0044)	-.0158 *** (.0045)	-.0296 ** (.0084)
年龄		.0007 (.0005)	.0005 (.0006)	.0001 (.0013)	.0002 (.0025)
教育		.0028 * (.0015)	.0043 ** (.0015)	.0041 ** (.0016)	.0076 ** (.0030)
户口类型		-.0200 * (.0118)	-.0170 (.0118)	-.0149 (.0122)	-.0279 (.0227)
党员		.0441 *** (.0133)	.0400 *** (.0132)	.0388 *** (.0133)	.0728 ** (.0249)

续表

变量	(1)	(2)	(3)	(4)	边际效应
现有子女数量		.1200 *** (.0082)	.1160 *** (.0081)	.1160 *** (.0083)	.2179 *** (.0157)
家庭人均收入		-.0021 (.0060)	-.0016 (.0059)	.0011 (.0060)	.0020 (.0118)
是否在家居住		.0247 (.0254)	.0213 (.0255)	.0038 (.0332)	-.0071 (.0623)
是否有养老保险		.0113 (.0097)	.0132 (.0097)	.0130 (.0100)	.0244 (.0187)
家庭人均储蓄		-.0015 (.0010)	-.0015 (.0010)	-.0015 (.0010)	-.0029 (0.0019)
自评健康			.0017 (.0048)	.0033 (.0049)	0.0062 (0.0092)
男孩偏好			.0162 *** (.0035)	.0157 *** (.0035)	0.0294 *** (0.0067)
传统观念			.0134 ** (.0042)	.0130 ** (.0043)	0.0243 ** (.0081)
配偶年龄				.0003 (.0013)	-.0006 (.0024)
配偶教育				-.0001 (.0013)	-.0001 (.0025)
配偶是否在家住				.0252 (.0215)	.0473 (.040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720 *** (.0297)	.3620 *** (.0790)	.2500 *** (.0822)	.2290 *** (.0859)	—
观测值	2984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限定样本范围

在已有文献对生育意愿的讨论中，研究对象通常是育龄妇女。本文基准模型中并未对研究对象做出限定，是由于家庭作为做出生育决策的单位，生育决策不仅受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也受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够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关注家庭的生育意愿。为了使实证结果与其他文献可比，这里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8至49岁的育龄女性，检验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见表6）。

表 6 稳健性检验—限定样本

变量	(1)	(2)
家庭金融脆弱性	-.007 (.009)	-.021* (.010)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718*** (.075)	1.109*** (.179)
观测值	1450	1450
调整后拟合优度	.097	.191

注：(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在控制所有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后，进入回归的育龄女性为 1450 个。最后一列回归结果显示，家庭金融脆弱性每增强 1 个单位，育龄女性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降 0.02 个，且该结果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说明本文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六、结论及讨论

在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加剧的宏观背景下，探究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不仅扩展并丰富了家庭金融的相关研究，更为我们理解家庭生育决策和当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使用 CFPS 数据，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和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增强会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果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对不同群体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来说，中等收入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于中等收入家庭收入渠道、投资渠道相对较窄，生育意愿相对较弱，家庭金融脆弱性会对其理想生育子女数量造成更大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无男孩的家庭，有男孩的家庭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程度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在传统男孩偏好下无男孩家庭具有较强的生育意愿有关。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低生育率的现状，提高居民生育意愿，不仅需要

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如通过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增加0至3岁托幼服务的供给、调控家庭教育投资无序竞争以及减少对已婚已育女性的就业歧视等措施来降低家庭的养育负担;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注和重视,家庭金融脆弱性不仅是全社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通过多方面具体措施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是必要且可行的。首先,要通过金融理财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大众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和风险意识,加强居民金融素养的培养和应对经济风险能力的提升。其次,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加大对于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力度,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最后,通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深化扶贫开发,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提高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更有利于给居民家庭创造稳定的生育环境,从而有效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水平。

参考文献:

- 陈卫、段媛媛,2019,《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人口研究》第1期。
- 陈卫民、李晓晴,2021,《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预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兼论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机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邓昌荣,2007,《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李建民,1994,《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个人生育决策的经济机制》,《人口研究》第1期。
- 柳清瑞、刘淑娜,2020,《家庭杠杆率的生育效应及其城乡差异》,《人口研究》第2期。
- 孟轲,2008,《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南方人口》第4期。
- 石智雷、杨云彦,2014,《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研究》第5期。
- 王金营、戈艳霞,2016,《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第6期。
- 谢永飞、刘衍军,2007,《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变迁——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人口与经济》第1期。
- 杨菊华,2015,《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姚从容、吴帆、李建民,2010,《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人口学刊》第2期。
- 尹豪、徐剑,2008,《“大连市生育成本调查”结果分析》,《人口学刊》第1期。
- 张冀、于梦迪、曹杨,2020,《金融素养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张冀、祝伟、王亚柯,2016,《家庭经济脆弱性与风险规避》,《经济研究》第6期。

- 张霞、夏巧娟, 2018, 《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 2016,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人口研究》第1期。
- 周晓蒙, 2018, 《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第5期。
- Aizen, I. & J. Klobas 2013, “Fertility Intentions: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emographic Research* 29 (8).
- Becker, G.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ldwell, C. J. 1976,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2 (3).
- Coale, J. A. & C. S. Watkins 2017,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rcon, S. & P. Krishnan 2000, “Vulnerability,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 (6).
- Easterlin, R. A. 1975, “An Economic Framework for Fertility Analysi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6 (3).
- Goldstein, J., W. Lutz & M. R. Testa 2003, “The Emergence of Sub-Replacement Family Size Ideals in Europ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2.
- Klasen, S. & H. Waibel 2015,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South-East Asia: Drivers, Measurement, Responses, and Policy Issues.” *World Development* 71.
- Kochar, A. 1995, “Explain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Income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2).
- Lesthaeghe, R. & J. Surkyn 1988, “Culture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1).
-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 (2).
- Ligon, E. & L. Schechter 2003,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3 (486).
- Lonnie, W. A. 2005, “Why is Fertility Lower in Wealthier Countries? The Role of Relaxed Fertility-Elec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 (1).
- Lusardi, A., D. J. Schneider & P. Tufano 2011, “Financially Fragile Household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072, Cambridge, MA.
- Minsky, H. 1982, “Can it Happen Again? A Reprise.” *Challenge* 25 (3).
- Rossier, C. & L. Bernardi 2009, “Social Interaction Effects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 (4).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郭云蔚